

张和龙 主编

English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The Studies
of English Writers
Volume I

英国文学研究在中国：
英国作家研究（上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外教社 外国文学研究丛书

上海外国语大学重点科研项目

上海外国语大学“211工程”重点学科三期建设项目

张和龙 主编

英国文学研究在中国： 英国作家研究（上卷）

English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The Studies of English Writers Volume I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文学研究在中国：英国作家研究(上、下卷)/张和龙主编.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外教社外国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446-3780-0

I. ①英… II. ①张… III. ①英国文学-文学批评史-中国

②英国文学-作家评论-文学批评史-中国 IV. ①I56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2910 号



出版发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200083

电 话：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张亚东

印 刷：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张 31.75 字数 82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46-3780-0 / I · 0272

定 价：90.00 元 (上下卷)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本书上卷作者

绪论：张和龙

第一章第一节：张和龙；第二节：杨开泛；第三节：曹航；第四节：李伟民；第五节：林元富、张和龙；第六节：张和龙

第二章第一节：张和龙；第二节：李淑玲；第三节：曹波；第四节：韩加明；第五节：葛桂录

第三章第一节：张和龙；第二节：杨柳；第三节：张和龙；第四节：张鑫；第五节：葛桂录；第六节：杨阳、张和龙；第七节：张和龙；第八节：李翼、张和龙

第四章第一节：张和龙；第二节：张和龙；第三节：张和龙；第四节：张和龙；第五节：闫琳；第六节：刘亚芬；第七节：朱瑞党、张和龙；第八节：路璐、廖昌胤；第九节：陆志国；第十节：张介明、张和龙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早期英国文学研究	19
第一节 总述	19
第二节 古英语文学研究	34
第三节 乔叟研究	48
第四节 莎士比亚研究	63
第五节 多恩研究	97
第六节 弥尔顿研究	109
第二章 18世纪英国文学研究	130
第一节 总述	130
第二节 笛福研究	146
第三节 斯威夫特研究	156
第四节 菲尔丁研究	167
第五节 布莱克研究	181
第三章 19世纪英国文学研究(上)	194
第一节 总述	194
第二节 拜伦研究	205
第三节 雪莱研究	222
第四节 济慈研究	245
第五节 华兹华斯研究	261

第六节	柯勒律治研究	278
第七节	奥斯丁研究	292
第八节	司各特研究	306

第四章 19世纪英国文学研究(下) 324

第一节	小说研究	324
第二节	诗歌研究	336
第三节	散文研究	352
第四节	狄更斯研究	367
第五节	萨克雷研究	392
第六节	夏洛蒂·勃朗特研究	406
第七节	艾米丽·勃朗特研究	424
第八节	乔治·爱略特研究	439
第九节	哈代研究	453
第十节	王尔德研究	471

绪 论

一、学术史研究的兴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的《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1898年)、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年)等著述开启了近代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先河。及至“五四”时期与30年代,学术史研究蔚然成风,其间名家辈出,著述纷呈,形成了国内学术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①。20世纪90年代,学术史研究在沉寂多年后又再次兴起^②。在这股方兴未艾的研究热潮中,各类学术史丛书和著作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③,学术史研究卓然而成一门“新兴的学

- ① 梁启超、王国维、钱穆、胡适、陈寅恪等著名学者在这一时期均有重要学术史著述问世。
- ② 1991年11月,陈平原在《学人》杂志创刊号上开辟“学术史笔谈”专栏,该栏刊登的陈本人的《学术史研究随想》与靳大成的《关于现代学术史的思考提纲之一》等文章被认为是当代学术研究的肇始。
- ③ 这些著述主要有陈平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史丛书”、季羨林作序的《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学术研究史丛书”、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系列丛书《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李学勤主编的11卷本《中国学术史》、张立文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学术通史》、靳德行主编的《当代中国思想史丛书》等。

科”^①。如果将 90 年代以来的这二十年称为“学术史时代”^②，并不为过。

学术史研究的兴起是 20 世纪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它充分反映了当代学人对学术研究本身的自觉与自反意识。20 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世纪，中国社会在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学术也完成了从传统范式向现代话语的全面转型。在新的学术理念与学术方法的带动下，中国学术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非凡成就。因此，回顾学术传统，反思现代知识体系，探讨学术范式的嬗变，评鹭研究得失与学术思想变迁，对寻求学术创新与推动学术进步是必不可少的。

学术史研究是关于研究的研究，是一种“元研究”。陈平原在《“学术史丛书”总序》中曾对“学术史研究”的性质、特点与作用进行过界定：“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③李学勤在《中国学术史》的“总序”中也指出：“学术有着自身的历史，同时又难免受到整个历史的影响和限制。研究学术的历史，从历史角度看学术，这就是学术史。”^④就外国文学而言，学术史即是要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外国文学研究在我国的发展、演变与发展的学术历程，对具体的学术成果、学术现象或学术问题进行梳理、辨别、讨论与评判，勾勒出完整且具有丰富内涵的学术研究传统与学科发展脉络。

我国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肇始于 19 世纪下半叶，其间历

① 余三定：《当代学术史研究：新兴的学科》，《中山大学学报》，2011 年第 2 期，第 138 页。

② 参见陈建华：《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年，第 1 页。

③ 陈平原：《学术随想录》，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7 页。

④ 李学勤：《中国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年。

经坎坷与波折,但成果斐然卓著。百年来的学术历程不仅见证了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形成,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有鉴于此,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吴元迈先生曾在20世纪末发出倡议:“我们的外国文学界应该创立一门独立的学科,‘外国文学学’。它以外国文学研究为对象,为己任,亦即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①关于这一学科的目的与任务,吴元迈先生也指出:“第一,对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及当前的热点和重点、成就和问题、不同的学术观点和学派、发展的趋势和方向等,做出全面的客观的评估;第二,对各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及其特点、方法、趋势和方向等做出分析;第三,对中国和外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课题和主要成果进行比较分析;第四,这样做,可以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包括二级、三级学科在内)的各种研究规划提供较为合理和坚实的基础,克服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中曾经出现过的‘拼盘’现象和不必要的课题重复,加强外国文学研究的整体性和全局性,使之更为合理和系统,以推动和促进今后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全面发展。”^②归纳起来,这四点也是“外国文学学”的几个主要研究方向,即外国文学学科史与学术史、国别文学学科史与学术史、中外学术史比较研究、外国文学研究整体规划等。

近十多年来,外国文学领域内的学术史研究建树不断,各类研究成果竞相涌现。单从学术专著来看,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就有龚翰雄的《西方文学研究》(2005年)、叶隽的《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2008年)、陈建华的《20世纪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2009年)、陈众议的《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与《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2011年)、李伟昉的《梁实秋莎评研究》(2012年)、李伟民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2012年)等。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

① 吴元迈:《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外国文学——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上的发言(1994年9月20日)》,《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第6页。

② 同上,第6页。

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课题“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史系列”完成结项，其中第一、第二系列由16部学术史研究专著、16部配套译著组成，涉及英、美、法、德、俄、西等国16位经典作家的研究史论，代表了“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最新突破与重要成就。不难看出，中国的“外国文学学”呈现出了可持续的发展前景与值得期待的研究态势。

从已出版的著述来看，国内学界的研究思路与方向不一而足，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点。从类型上看，可分为以下几种：一、外国文学学术断代史研究，如《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二、区域文学学术史研究，如《西方文学研究》；三、国别文学学术史研究，如《20世纪我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四、外国经典作家学术史，如《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五、著名学者的个案研究，如《梁实秋莎评研究》。不过，外国文学的学术史研究仍然存在明显不足，如完整的外国文学学科史著作仍然付之阙如；除德、俄以外的其他国别文学学术史研究仍无突破；虽然以《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为代表的经典作家学术史系列著作已经或即将面世，但更多外国经典作家的学术史仍无系统性的专题研究；对具体学者的个案研究尚未深入展开；除外国经典作家学术史外，其他类型的学术史研究仍然形只影单，还未形成规模。

总的看来，“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极为引人注目，但其中仍有很多领域有待开拓，尤其是在国别文学学科史、学术史与经典作家学术史方面，值得探索与研究的空间巨大。

二、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及其学术史构建

英国文学研究在英国相当于是“国学”研究，在中国则是外国文学研究之一种。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工作可分为“英国文学翻译”与“英国文学评论”两个方面，但狭义的“研究”应该仅指后者。整体而言，我国的英国文学翻译史、译介史研究已经比较发达，代

代表性的著述已经有很多。然而,国内尚未出版一部英国文学研究史、学术史或学科史方面的独立著述。中国百年来的英国文学研究并非乏善可陈,其成就有目共睹,因此在学术史层面上进行回顾与总结、反思与估价就显得十分必要。这正是构建中国的“英国文学学术史”的重要前提。

在“西学东渐”日盛的晚清,英国文学是最早被中国学者译介与研究的国别文学之一。清末民初,鲁迅、梁启超、王国维、林纾等中国近代学人“求新声于异邦”,或启蒙或救国或建设新文学,使英国文学的译介与评论带有强烈的实用目的。20—30年代,“新文化运动”推动了包括英国文学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的极大发展,国家在形式上的短暂统一也使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一度出现令人欣喜的繁荣局面。就英国文学而言,莎评成绩最大,同时还出现了“拜伦热”、“雪莱热”、“王尔德热”、“萧伯纳热”。抗战爆发后,在救亡图存的主旋律中,学术研究的自足性、本体性受到极大干扰与影响,但是对英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并未出现有可能出现的“断层”现象。新中国成立后,包括英国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研究奉行“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批评标准,政治化的研究模式成为学术主流。“文革”期间,极“左”思潮达到极致,学术活动几乎停止,学术研究处于“休克”状态,学界走过了一段“学术断裂期”。“文革”结束后,学界开始拨乱反正,政治上逐渐走向平稳与安定,思想解冻,文化活跃,英国文学研究得到全面恢复。自80年代中叶起,学术研究逐渐进入一段繁荣发展期。90年代后期,高校扩招,英语专业迅猛扩张,跃居全国“第一专业”,英美文学师资队伍十分庞大,英国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一样,进入了一段学风浮躁、良莠不齐的历史新时期。一百多年来,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走过了一段曲折而波动的学术历程,并取得很多引人瞩目的重要成就。回顾这一历史进程,确立学术传统,评估范式流变,反思研究得失,为英国文学的未来研究提供必要的学科史基础与学术史背景,正是学术史构建的主旨与要义所在。

一门学科的发展史与整个中国的学术发展史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考察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学术史的构建显得尤为必要。因此，英国文学学科史、学术史的构建不仅要把握学科自身的内部发展规律，也要探讨作为整体的中国学术的发展规律，从而对学术史的分期与发展阶段做出严密而精确的描述，为英国文学研究提供微观与宏观上的学术史脉络与发展轨迹。季羨林在《〈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序》中把20世纪的中国学术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一、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夕，约为1900年—1917年；二、“五四”运动十几年，约1917年—1930年；三、1930年—1949年；四、1949年—1978年改革开放；五、改革开放至世纪末。^①这一分期也大致适用于外国文学学术史的历史分期。陈建华在《20世纪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中将中国俄苏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清末民初、“五四”时期、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新中国前30年、新时期以来。周小仪在《英国文学在中国的介绍、研究及影响》一文中把英国文学在中国的学术发展历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上半叶、20世纪中叶、20世纪晚期和当代四个阶段^②。陈建华、周小仪的历史分期虽然与季羨林的分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在学理上是相通的。其相通之处在于学术史的分期充分体现了特定学科与政治制度、社会思潮、文化转型之间的密切关系，其差异之处则是在学科层面上试图反映学术自身的演变发展规律与内在特征。

可以说，英国文学在中国的研究历程既有其内部学术规律的支配，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百年来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与思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陈平原在《“学术史丛书”总序》中说：“无论是追溯学科之形成，分析理论框架之建构，还是分析具体的名家名著、

① 季羨林：《〈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序》，《光明日报》，2002年10月17日。

② 周小仪：《英国文学在中国的介绍、研究及影响》，《译林》，2002年第4期。

学派体系,都无法脱离特定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①因此,探讨不同时代政治、社会、历史与文化语境的变化如何影响英国文学研究与接受的历史轨迹,对我们理解不同历史时期研究模式与价值立场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周小仪指出,20世纪20—40年代,英国文学研究与启蒙主义、社会政治关系紧密,40—70年代出现了以阶级斗争概念为基础的中国研究模式与批判传统;80年代开始出现审美的复归,90年代以来则出现了“非殖民化”的研究趋势。^②这是历史性的纵向探讨。此外,共时性的横向比较也非常重要。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不同的作家因为主旨与题材、风格与流派各不相同,在中国的研究与接受也会产生很大的差异。例如,建国“十七年”中,“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文学因具有“进步性”、“人民性”、“革命性”而备受青睐,现代派文学因“颓废”、“反动”则遭遇贬抑与批判,其学术逻辑是典型的阶级分析法,其背后是一元化政治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影响。再如,新时期以来,“现代派”文学一度在外国文学研究界形成研究热潮,而“十七年”中学界热捧的一些“重要”作家,一些被视为“经典”或“进步文学”的作品(如《牛虻》),则受到国内研究界的冷落。由此可见,时代的变化带来了价值立场的变化,价值立场的变化又带来了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式的变化。考察其流变过程及其内在动因,正是构建英国文学学术史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陈众议在《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一书中指出:“学术史研究不仅是一般博士论文的基础,同样也是任何经典作家、流派思潮研究的基础。没有学术史背景,就谈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③“学术史背景”可以是某一门学科乃至整个中国的学术发展历史背景,在“外国文学学术史”中还可以是经典作家的学术史背景。研究英国

① 陈平原:《学术随想录》,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② 参见周小仪:《英国文学在中国的介绍、研究及影响》,《译林》,2002年第4期。

③ 陈众议:《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5页。

经典作家,就不能不了解该作家在中国的学术史,就不能不了解英国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因为单个作家的学术史与所属学科的学术史、发展史又是密不可分的。英国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自有其特定的研究传统,具体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也有特定的学术传承。在学术繁荣、信息爆炸的今天,任何研究都很难做到白手起家。所谓“填补学术空白”,只是相对于前人的研究而言。任何学术创新必然是相对于特定的学术传统而言,必然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取得的。“任何论文的写作都隐含着学术史梳理。不具备一定的学术史视野,哪怕是潜在的学术史视野,一切学术研究都是很难想象的。”^①只有对学术史做深入的考察,才能在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时知道哪些是前人研究的薄弱环节,哪些是前人未曾涉足的课题,才有可能另辟蹊径,言前人之所未言,或对前人学术观点进行独到的补正或纠偏;才不会盲目地炒冷饭,或发生低水平重复的现象。对前人的研究,应该具有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态度,应实事求是、中允、客观地给予应有的尊重。拥有学术史的知识背景,对任何学术问题的探讨就会有所依托,就不会随意妄言“创新”、“突破”或“填补空白”。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就学术研究而言,这句话仍然是学界众人不得不恪守的至理名言。

三、学术史研究的历史回顾

历史地看,以“英国文学研究”为对象的“学术史意识”最早萌芽于民国时期,其成果主要是一些零散的评介文章,其中以介绍国外的经典作家研究状况为主,并形成早期特有的“译介模式”。例如,在莎士比亚学术史研究方面,张沅长可能是国内最早使用“莎

^① 陈众议:《文学“全球化”背景下的学术史研究》,《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1期,第56页。

学”这一概念的学者。他在《莎学》一文中梳理了莎剧研究在英国的学术历程,指出英国的“莎学”“比中国的红学还要兴盛”^①。陈铨在《十九世纪德国文学批评家对于哈孟雷特的解释》(《清华大学学报》1934年第4期)一文中则全面介绍了莱辛、歌德、施莱格尔、叔本华等德国学者的莎评学术观点^②。再如,关于拜伦学术史研究的成果则有张闻天翻译的《勃兰克斯的拜伦论》(《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第4期)、诵虞翻译的《泰因的摆伦论》(《学灯》1924年4月28日)等。这些零星的学术史研究成果基本上是经典作家的国外学术史译介,而对该作家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仍未进入学术史层面上的关注,其原因与当时英国文学研究尚不发达有很大关系。此外,国内英语学科的发展还处于历史的早期,部分高校的英文系创立伊始,专业研究队伍仍比较零散薄弱,虽然也有一些高质量研究成果,但交通不便、信息不畅、资料缺乏等,非常不利于学术史研究的早期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学者对英国文学的研究成果被大量翻译成中文,学术史研究的“译介模式”得以延续,并出现了一些零散的文章。在经典作家学术史方面,则主要译介苏联的相关成果,如康斯拉特叶夫的《苏联关于英国文学史的论著》(《文史哲》1954年第4期)、方元翻译的《普希金论莎士比亚》(《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3期)、李邦媛翻译的《别林斯基论莎士比亚》(《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3辑,1962年)、伊瓦雪娃的《关于狄更斯作品的评价问题》(李筱菊译,《文史译丛》1956年第1期)。在莎学方面,中国对英

① 张沅长:《莎学》,《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1年第2期,第293页。

② 此外,还有梁实秋的《哈姆雷特问题》(《文艺月刊》1934年第5卷第1期)、周骏章翻译的《莎学述要》、仲持的《狄那摩甫论莎士比亚》(《文学》1936年第6卷第3期)、以人翻译的《恩格斯论莎士比亚》(《东流》1936年第2卷第4期)、金云育的《皮林斯基论莎士比亚》(《重庆国民公报艺术部队》1941年9月17日第58期)、梁实秋的《莎士比亚在18世纪》(《益世报》1933年1月27—28日、2月4日)等。这些成果代表了国内早期莎士比亚学术史研究的发端。

国莎学译介的数量最多，对俄苏莎学译介的数量则居第二位。学界对西方的学术研究有一些评介，但态度与立场则完全不同。当时的研究立场以阶级划分，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属于冷战中敌对阵营的一方，他们的研究成果大多被贬斥为“资产阶级学术”。袁可嘉、王佐良等人对英美“新批评”以及艾略特文学批评的极端批判，明显受到了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朱虹发表的《西方关于汉姆雷特典型的一些评论》一文，虽然对西方17、18、19、20世纪的汉姆莱特批评做出了详尽的评述，但明显是站在典型的无产阶级立场来评介“西方资产阶级”莎学的，并认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莎评“更有参考价值”^①。此文的政治批判意味非常明显，体现出了一种亲苏联、贬西方的学术价值观。

建国“十七年”中，在学术史研究方面取得重要突破的是1959年卞之琳等人发表的长文《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工作的》。这是“外国文学学”研究领域中的早期标志性成果。几位学者对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进行了理论性的深入论述，第一次梳理出了清末以来外国文学译介与研究工作的“优良传统”，即“重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重视欧洲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特别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重视东欧被压迫民族的文学。而总的说来，这种传统的特色是：既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又注意作品的艺术性；要求为革命服务，也要求为创作服务。这些特点也是为我国社会的实际需要所规定的。”^②由于过于强调阶级分析，这篇文章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与鲜明的时代特征。作者指出了外国文学研究工作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即“我们的一些研究工作者既表现了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和治学方法的影响，也表现了类似庸俗

① 朱虹：《西方关于汉姆雷特典型的一些评论》，《文学评论》，1963年第4期，第124页。

② 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陈棨：《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工作的》，《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第41页。

社会学的倾向。”^①当时学术界一味用阶级分析的视角来评判西方的文学研究显然不妥,但大胆指出当时学术研究的突出弊端,即“庸俗社会学”的倾向,也实属难能可贵。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长文较多涉及建国十年来的英国文学研究,并对其中不少学术成果的利弊得失进行了敏锐而中肯的分析。作者通过评点具体的学术研究成果,如杨绛的《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全增嘏的《读狄更斯》以及方重的《乔叟的现实主义发展道路》,对当时一些所谓“不当的”研究倾向进行了批评。这些“不当的倾向”主要有:把作品看成是社会现实的纯客观的反映,因而“曲解了现实主义的概念”;为了某个特定目标而在小说里寻找例证,因而“不免自陷于牵强附会”;把作品内容与重大历史事件“硬套”在一起,等等。撇开政治化的因素外,其中很多学术评价不失精当、准确。几位作者用批判的眼光对待国内外已有的学术研究,这代表了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内“批判传统”的建立,对于今天不加鉴别、一味跟风乃至完全认同西方学术研究的弊病仍然具有很大的警示意义。

1979年,黄梅等人发表的论文《英美文学研究三十年》则对新中国头三十年的英美文学研究进行了专题探讨,开启了英国文学学术断代史的研究模式。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1949年至1959年、1959年至1966年“文革”爆发前、1966年“文革”爆发后至1979年。作为国别文学学术史研究,它在体例上与卞之琳等人的文章明显不同,即探讨在总的外在学术环境影响下英美文学研究的波动与嬗变,也具体评析了这一时期英美文学研究的重要特征与学术影响源头。如作者在分析建国后第一个10年的英美文学研究时指出:“当时的文章几乎全部以经典作家为研究对象,尽管可以说是体现了各种复杂思想影响的交织,但其中占主导地位的

^① 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陈桑:《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工作》,《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第75页。